

第 17 卷 第 2 期 2024 年 9 月

(本期译自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116,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主办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7 卷第 2 期 2024 年 9 月

Vol. 17, No. 2, September, 2024

国际高等教育

| | |
|---------------------------------|----|
| 就业能力正在取代高等教育吗? | 1 |
| 复杂但至关重要: 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使命 | 4 |
| 国际分校: 当前趋势与未来可能性 | 6 |
| 穆斯林社会的高等教育研究 | 9 |
| 高等教育研究的指数增长及同行评审面临的挑战 | 12 |
| 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的转型: 利益相关者的看法 | 14 |
| 韩国学生海外留学模式的变化 | 16 |
| 澳大利亚: 腐败丑闻与国际学生 | 19 |
| 通过协作式在线国际学习提升国际化: 平衡证据与普及 | 22 |
| 虚拟交流不断演变的格局: 第三次全球调查的发现 | 24 |
| 欧洲的学术薪酬与职业发展: 吸引人才的挑战 | 26 |
| 在叙利亚西北地区大学学习的挑战与困难 | 28 |
| 中亚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私有化 | 30 |
| 新书推介 | 33 |

注: 本期文章选译自美国波士顿学院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第 116 期。

就业能力正在取代高等教育吗？

西蒙·马金森

西蒙·马金森 (Simon Marginson)：英国牛津大学 (Oxford University) 高等教育教授、英国 ESRC/RE 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件：simon.marginson@education.ox.ac

在前几期的《国际高等教育》中，前经合组织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主任德克·范·达姆 (Dirk van Damme) 质疑了高等教育参与度的扩大。达姆指出：有迹象表明，高水平的大学教育并不总是对社会和经济有积极影响，其中存在着毕业生就业不足、过度教育、技能不匹配和替代效应。他认为对短期课程和非传统认证（如微证书）的兴趣迅速扩大，这一现象更有前景。

与达姆同在经合组织的教育与技能部门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彻 (Andreas Schleicher) 也同意这一观点。他在 2023 年 3 月的伦敦会议上表示，微证书“能更好地向雇主证明持证人知道和能做的事”，并再次将其与大学文凭进行了有利的比较。他表示，对大学而言，生活“实际上是非常舒适的”，“（大学）可以将课程内容、传授、认证捆绑在一起——大学可以获得相当不错的垄断租金”。转向微证书将意味着提供者的地位不再重要。看来微证书是实现公平的新途径。

很难相信将中产阶级的学位与大众的微证书结合起来会创造社会公平，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经济政策制定者对我们所知的高等教育失去了耐心。

英国的“教学卓越框架” (Teaching Excellence Framework) 根据毕业生薪资比较不同机构和学科中学生的学习质量。因为毕业生薪资低于平均水平，一些课程被污名化

为“低价值课程”。在澳大利亚，国家政府呼吁需要培养“为就业做好准备的毕业生”，并资助了微证书项目的发展。

在每种情况下，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都是相同的。高等教育应该是主要（或唯一）的、直接的职业教育。培养“为就业做好准备的毕业生”的想法概括了这一点。但高等教育并不适合这个特定的目的。准备就业是其使命之一，但从未是核心使命。更不是唯一的使命。高等教育不是主要为了培养“有就业能力”的毕业生。它是通过学科知识的熏陶对人进行的文化塑造。学生通过深入学习各学科和专业领域的知识来发展自身技能，或者说“形成” (form) 自己。统一高等教育的是知识，而不是就业能力。

内在和外在的使命

高等教育有多重使命，正如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将大学称为“多元世界”的著名论断。其使命有两种：内在使命和外在使命。

内在使命，即高等教育的经典核心，是教育学生，传递、创造和传播知识。这些使命塑造了高等教育的内部组织。教学与学习以及学术与研究，扎根于认知学科、学习项目和院系。这两个内在的使命是交织在一起的。学习是知识密集型的。教学和学术之间的联系是学术身份和工作的规范。这些

内在活动的价值不是通过政策、市场或社会影响来衡量，而是通过内部使用的教育工具，如考试、评分、同行评审和学术质量保证来衡量。

历史上有几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它们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但都具有相同的内在核心。在中国，西周（公元前 1047~771 年）通过深入学习关键文本来培养学者官员。在亚历山大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北印度的佛教寺院（如毗克拉姆希拉和那烂陀）、地中海的伊斯兰学术、始于 1088 年博洛尼亚的中世纪欧洲大学、从康德和冯·洪堡到约翰·亨利·纽曼再到美国研究型大学（始于 1876 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每一次迭代中，所有大学都通过对知识和学术的文化熏陶来培养学生。

至于内在核心，正如格特·比埃斯塔（Gert Biesta）在 2009 年所述，高等教育发挥着“社会化”和“主体化”的功能。社会化意味着灌输社会和职业规范。主体化指的是教育的“个体化”效果，通过这种效果，学生成为自我实现的主体。比埃斯塔指出，“任何名副其实的教育都应始终有助于主体化的过程，使受教育者在思考和行动上变得更加自主和独立”。通过这种方式，高等教育为学生的整个人生（包括工作）做好准备。

高等教育也有外在的使命，它与其他社会部门（包括政府、雇主、专业人士和当地社区）合作来完成。比埃斯塔提到了教育功能的“资格”（qualification），指学习如何做事，特别是在工作场所。在外在领域，外部代理人帮助确定活动的价值。在这里，毕业生薪资和就业率成为了考量因素。

然而，经济政策往往只关注外在的就业准备，忽略了其他使命。微证书将高等教育简化为“资格”，并将其分解为散乱的碎片。

教育与工作

如果经济政策从一开始就把高等教育的重点仅仅放在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上，那么它就不会把文化的形成、学术知识和教学/研究的关系作为基石。但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期望要更高。

研究反复发现，大多数学生在高等教育中有多重目标。他们希望个人发展、沉浸于学科知识以及获得毕业后的工作；这不是非此即彼。在学习期间，许多学生不仅在学习，还在工作。但我们不应模糊教育与就业之间的区别，两者是不同的世界。机构定位、目标、价值观、知识集和技能以及所需行为都是不同的。技能和就业能力的培养在工作场所本身更为有效。接受教育和工作的多样性是改善教育与工作之间过渡和结合的第一步。

即使在许多职业课程中，从学校向工作过渡也是一项挑战，需要时间。高等教育和工作最好被理解为松散耦合。高等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流动的。把教育和工作强加在一个单一的过程中——要么将它们视为本质上相同的东西，要么把其中一个从属于另一个——都是对工作或高等教育的侵犯。不难猜测哪一个更容易受到伤害。

高等教育位于学校教育工作的中间。它更偏向于学校教育而不是工作。但经济政策希望高等教育能够复制工作并以与工作相同的标准来评价它。

内在与外在使命的对立

内在教育功能与政策和媒体的职业期望之间出现了鸿沟。没有必要将内在教育与外在贡献对立起来，也没有必要将职业技能与学术知识对立起来。但是，澳大利亚和英国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政策制定者，正在坚定地试图将人力资本的形象（即外在的就业准备使命）来取代内在的教育使命，而不是与之并行不悖。

就业能力正逐渐嵌入大众高等教育，且具有相当大的道德权威。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份工作，并将工作视为一项人权。然而，高

等教育在直接准备就业方面并不十分有效，无法创造就业机会，而就业能力的口号掩盖了其核心教育使命，即通过学科知识的熏陶对学生进行的文化塑造。“为就业做好准备的毕业生”这一概念也随即产生了无法实现的期望。我认为这正在成为高等教育的生存危机。

复杂但至关重要：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市场使命

菲利普·G·阿特巴赫、汉斯·德·维特

菲利普·G·阿特巴赫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教授、荣誉学者

电子邮件: altbach@bc.edu

汉斯·德·维特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荣誉教授

电子邮件: dewitje@bc.edu

高等教育是一个多层面的现象，为个人和社会服务。但从今天的政治话语和社交媒体中，人们却难以看出这一点。我们听到的都是关于劳动力培训的讨论，有时还有对大学的批判，称其成为“觉醒主义”或其他所谓罪过的温床。

事实上，高等教育毕业生一生的平均收入比非毕业生要高得多。他们所在的高等教育机构也适应了劳动力市场的新现实，甚至应对了新冠疫情的限制，入学率在某些例外情况下也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然而，美国大约一半的人口已经对高等教育失去了信心，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即使职业教育的毕业生需求量大且报酬丰厚，然而大多数批评者仍然让他们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

劳动力培训的历史视角

大学一直参与我们现在所称的劳动力培训。第一所欧洲大学，即 1088 年在意大利成立的博洛尼亚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培养了为教会、法律和医学领域服务的年轻人。但它也提供了我们现在所称的“通识教育”（数学、人文学科和逻辑学的教学）的课程内容，其他后来成立的大学

也是如此。哈佛大学的创始人哀叹缺乏受过教育的基督教牧师，于是在 1636 年创办了这所学院，不仅提供神学培训，还教授英式通识教育，并且其课程范围很快扩展到其他专业领域的教育。

后来，在美国内战期间，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 于 1862 年签署了《土地赠与法案》(the Land-Grant Act)，以“惠及农业和机械艺术”。新的公立大学，如密歇根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和威斯康星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加上几所新的私立机构，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和芝加哥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致力于培养推动美国成为工业强国的人才，这些大学将各种形式的通识教育与就业准备相结合。法国在拿破仑 1808 年的改革之后，建立了以职业为导向且享有盛誉的“大学校” (grandes écoles)，这些学校至今仍然存在。

当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在十九世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时，建立了服务于专业和职业需求的大学。来自截然不同的知识传统，中国在八世纪建立了学院，提供儒家经典教育，后来培养年轻人进入官僚体系，从而提供了一种形式的劳动力培训。

研究也成为高等教育使命的关键部分。十九世纪，研究型大学在德国诞生，当时德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主要强国。美国和日本采纳了研究型大学的理念。在其他地方，如法国、苏联和中国，大多数研究在专门的研究所进行，而大学则专注于教育和职业培训。

二十世纪的扩展

因此，现代大学作为一个强大且非常成功的机构出现，提供培训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经济发展，进行科学研究，既贡献基础知识也推动应用创新，并且在许多情况下，提供广泛的教育，帮助理解社会和培养批判性思维。

二十世纪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服务于日益复杂的经济发展和前所未有的学生数量。因此，高等教育从精英的特权转变为大众事业，越来越被视为社会流动性的必要条件并提供了成功所需的知识。学术界从一个小规模的精英领域，发展为一个广泛而多样化的系统，满足社会、经济和个人的多重需求。

在美国，社区大学在二十世纪中期扩展，作为提供职业（工作场所）培训的“开放门”机构，同时为学生提供一些通识教育。美国有 40% 的学生就读于社区学院。在欧洲，职业教育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全球来看，学术系统在多样化的情况下更为成功，通常包括精英研究型大学、大众化的入学机构和以职业为导向的学校，且常常由公立和私立机构共同组成。

二十一世纪的要求

在全球范围内，媒体和政府都在关注“劳动力发展”或其他职业需求。事实上，大多

数高等教育机构一直都参与培养职业人才，无论是在职业领域还是其他领域。总体而言，它们在具备职业和专业培训的同时，还兼有更广泛的教育目标。在这一点上，研究型大学与职业学校之间的分界线实际上是个误解。研究型大学越来越多地将两者结合起来（例如，一年制的专业硕士、两年制的研究硕士的出现，以及与博士学位并存的职业博士学位的兴起）。类似地，非大学的职业教育部门也呈现出对研究越来越重视的趋势（反映在名称的改变，如“应用科技大学”），甚至呼吁成为研究型大学。在美国，一些社区学院现在也提供学士学位。

高等教育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如今，大多数人在职业生涯中不仅从事不止一个工作，甚至可能拥有多个专业领域的技能。随着就业市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这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目前对人工智能的关注及其对未来工作和职业的潜在影响，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现实。人工智能、全球化以及其他二十一世纪的技术发展等因素将产生巨大影响——只是我们尚不清楚即将到来的“就业革命”（job revolution）将朝哪个方向发展。

这意味着，高等教育需要提供“软技能”和广泛的知识，以应对一个不可预测的未来。换句话说，教育机构需要继续做它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但要以更高效的方式，结合对未来可能情景的理解。此外，这种方向不应仅限于精英高等教育领域，而应向所有人开放。发展一个多样化的教育系统是必需的，既要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也要应对劳动力市场的要求。这一点对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需要进一步多元化。

国际分校：当前趋势与未来可能性

史蒂芬·威尔金斯

史蒂芬·威尔金斯 (Stephen Wilkins)：阿联酋迪拜英国大学 (British University) 教授

电子邮件：stephen.wilkins@buid.ac.ae

国际分校现已成为跨国教育的一种既定形式。国际分校是由高等教育机构在外国设立的实体校园。

定义问题

目前，对于国际分校的规模、课程设置、校园设施和分校所有权的界定尚无共识。例如，如果一所机构注册学生少于 100 人，只在办公楼的几间办公室内运营，且实际上由东道国政府或公司拥有，那么它是否应被归类为国际分校？

对国际分校定义缺乏共识，加上东道国和来源国的多样性增加，使得很难统计出全球范围内这类机构的数量。尽管跨境教育研究团队 (Cross Border Education Research Team) 估计有 333 所分校，但 Transedu 研究小组声称全球有 487 所这样的机构。可能是 C-BERT 遗漏了一些实际存在的分校，或者 Transedu 将一些不应归类为国际分校的机构计算在内。

逝去的潮流，还是依旧盛行？

在 2007~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 2018~2019 年期间，有几位研究人员和记者声称国际分校的潮流已经结束。然而，近年来，每关闭一所分校，就会有三到四所新分校开设。实际上，开设国际分校的失败率可能在 10~15% 左右，这远低于所有行业的国际初创企业的平均失败率。

过去两三年里，对于建立国际分校的兴趣并未如广泛预测的那样减少，反而增加了，无论是在希望接待此类机构的国家还是在来源国的大学中。埃及已经建立了几个专门的中心，热衷于接待来自不同国家的大学。甚至中国也在简化外国教育机构建立新分校的程序。此前，外国大学只能与本地合作伙伴在中国建立分校，但海南省的新法规允许外国机构独立运营分校。如果德国比勒费尔德应用科技大学 (Bielefeld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按计划于 2023 年底在中国大陆开设校园，它将成为首家在中国大陆独立开设校园的外国大学。

国际分校关闭的原因

新国际分校开设时通常有很多宣传，但分校关闭时通常没有或很少有媒体报道。此外，机构和东道国合作伙伴很少公开评论分校关闭的原因，因此具体分校关闭的确切原因很少为人所知。最常见的分校失败原因是学生注册人数低、未能满足学历认证要求、合作关系问题以及资金问题。

有时机构因缺乏基于明确目标的连贯战略而失败。由东道国政府或国有公司所有并未减少关闭的风险。迪拜投资公司最近关闭了其两所分校，即迪拜巴拉曼德大学 (University of Balamand) 和迪拜莫杜尔大学 (MODUL University Dubai)。两所分校的学生注册人数相对较低，且在满足东道国或

来源国的认证标准方面遇到困难。

当前发展和所有权趋势

由于新冠疫情期间潜在的国际学生无法或不愿出国留学，许多人选择在本地分校学习。阿联酋的几所分校报告说，学生招募方面创下纪录。在过去的两年里，国际分校几乎以每月一家的速度开设，东道国和来源国的多样性也有所增加。例如，印度不仅邀请外国大学在印度开设分校，最近的立法还首次允许印度公立机构在国外运营。2023 年 4 月，印度国家法医学大学（National Forensic Sciences University）成为首家在乌干达开设校园的公立机构。

国际分校通常与高等教育商品化有关，这意味着收入和利润是机构的关键动机。不仅许多大学更像企业一样行为，受到财务和声誉目标的驱动，营利性公司也参与了该领域。在某些情况下，营利性公司提供场地、设施和支持服务，并负责学生招募，例如 Navitas 教育集团为莱比锡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 Leipzig）提供服务。还有一些营利性公司对国际分校的控制更大。例如，跨国学术集团（Transnational Academic Group）声称它“拥有和管理”了迪拜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 Dubai）和加纳兰卡斯特大学（Lancaster University Ghana）。

一些评论者认为，营利性公司参与分校运营可能会降低教育质量。然而，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十分有限。例如，完全由阿曼达特控股（Amanat Holdings）拥有的迪拜米德尔塞克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 Dubai）已获得当地认证机构的最高五星级评级，并在学生注册人数上成为迪拜最大的私立大学。

未来的可能性

国际分校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开设和关闭。成功吸引学生或外部资金的机构将继续繁荣，而那些学生人数少或学术质量有问题的机构如果不克服这些弱点，可能会面临失败。地缘政治和东道国的政治变化将继续对分校模式的可持续性产生重大影响。

未来对于希望开发新离岸分校的机构以及现有的分校来说，机遇和挑战并存。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希望开设国际分校的愿望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显著改变全球跨国教育格局。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阿曼苏丹国，最近通过了新立法，以便外国大学更容易和更具吸引力地设立分校。目前，外国大学正在争相进入这些国家。澳大利亚的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和中央昆士兰大学（Central Queensland University）抓住了新机遇，成为首批在印度尼西亚开设分校的外国大学。此外，预计澳大利亚的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将成为第一所在印度建立校园的外国大学，校园位于古吉拉特邦国际金融科技城（Gujarat International Finance Tech Cit），计划于 2024 年中期投入运营。

大多数国际分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合作伙伴。因此，这些合作伙伴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何发展，将对 2030 年代的分校部门产生重大影响。2021 年，新加坡国立大学宣布将结束与耶鲁大学的合作。据悉，新加坡合作伙伴希望在学术标准和自由方面拥有更高的独立性，而东道国政府则对公共资金的担忧有所增加。

目前尚不清楚卡塔尔基金会和阿布扎比政府将继续为外国大学分校提供全额资助的时间有多长。未来某个时候，政府可能会决定将分校国有化。在卡塔尔，北大西洋学院

（College of the North Atlantic）已于 2022 年 学 （ University of Doha for Science and
停止运营，现在是一所名为多哈科学技术大 Technology）的独立机构。

穆斯林社会的高等教育研究

尤瑟夫·伊克巴尔·奥尔达克

尤瑟夫·伊克巴尔·奥尔达克 (Yusuf Ikbal Oldac)：香港岭南大学研究生院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件：yusufoldac@ln.edu.hk

全球研究扩展速度空前。来自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为全球科学做出贡献，其中包括穆斯林社会的研究人员。在现代科学中，研究产出通过科学出版物数量、引用影响力和其他替代指标来衡量，穆斯林社会中的高等教育研究可被视为新兴研究。

本文讨论了穆斯林社会中发表论文最多的 15 个研究系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 15 个系统在全球“科学网” (Web of Science) 上发表了占全球 5.15% 的论文 (1,702,039 篇文章，占全球总数的 33,026,981 篇)，尽管其人口总和占世界总人口的 14.16%。换句话说，这些研究系统起步较慢。然而，穆斯林社会中的研究正逐步加速，因为其中一些系统现在是全球增长最快的。

穆斯林社会在科研生产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 15 个国家中，只有土耳其和伊朗发表的论文数超过了 206,684 篇的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 483,735 篇和 408,463 篇。紧随其后的是埃及、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后四个体系在过去三十年中发表的论文数量较为接近 (在 10~20 万篇之间)。这六个系统在系统规模方面有所不同，因为其他系统在过去三十年的出版数量明显较少。

显著的增长率

尽管穆斯林社会在研究出版物体系规模方面大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其增长速度

却非常显著。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伊朗在内的一些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增长率，正如马金森 (Marginson) 最近的一项研究所示，它们的增长率超过了一直被誉为快速增长的中国。

衡量一个社会研究贡献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是研究强度，即出版物总数除以人口数。根据这一指标来看，虽然穆斯林占多数的系统在 20 世纪前 10 年之初发表的研究数量较少，但这一趋势在该时代后期开始改变，当时所选的 15 个穆斯林社会中的九个开始表现出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研究强度。至 2020 年，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伊朗和土耳其是穆斯林社会中研究强度最高的国家。

这一增加的趋势，加上穆斯林社会在全球中所代表的显著人口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勾勒出了一幅穆斯林社会研究人员对全球科学贡献增加的光明前景。

国际和国内研究合作

已发表研究的连通性 (通过共同作者来衡量) 也可以帮助理解科学体系的性质。穆斯林占多数的体系在国际研究合作比例上往往高于国内研究合作比例，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更高。

对此有两种解释。文献中反复使用的一

种解释是，规模相对较小和新兴的系统更倾向于进行国际合作，因为它们在国内的合作者较少。例如，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分别有 83%、80% 和 80% 的论文是通过国际合作发表的，而世界平均水平是 27%。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土耳其和伊朗作为较大的系统，其国际研究合作水平更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 28% 和 34%）。

另一种解释是，由于语言和数据库覆盖的问题，国内合作在全球科学中可能不那么明显。国内研究出版物不必使用英语，这些出版物在全球范围内的可见性较低。

科学影响力

科学出版物的数量只能展示部分情况。通过引用相关数据来衡量的科学影响力，可以进一步了解穆斯林占多数的系统其科研表现如何。

在所研究的穆斯林社会中，科学影响力在资金充足和规模较小的体系（如海湾地区的那些国家）中较高。尽管这些系统的规模较小，但它们在引用认可方面表现出色，它们有超过 40% 的出版物出现在国际顶尖期刊的前四分之一期刊之中。此外，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文献中，分别有 16%、14% 和 12% 处于全球前 10% 的引用百分比，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表面上看，这一发现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优势。然而，相关文献中关于全球排名和对海外学者双重隶属关系资助的讨论也应予以考虑。即使在最成熟的系统中，这种做法也存在；然而，海湾地区的系统既具备了这样的条件（相较于其他系统，它们的资金较为充足），也有这种动机（作为新兴系统希望迅速上升）。

研究领域相关分析

对出版物的研究领域相关分析可以更细致地展示穆斯林社会对全球研究的贡献。数据显示，穆斯林社会对 STEM 领域的关注有所增加，这与全球趋势一致。然而，前 15 个穆斯林社会在人文学科研究上的关注度持续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例如，根据 WoS 的数据，全球约有 4% 的研究涉及人文学科，而穆斯林社会在过去三十年中人文学科研究的平均比例约为 1%。

这背后可能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穆斯林多数系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可能在国际数据库中不够显著，因为这些研究未以英语或英美学术期刊文章的方式发表。这可能是一个强有力的理由；可见度低并不意味着不存在。

第二个原因可能与人文科学研究与研究系统自由度之间的关系有关（参见玛莎·努斯鲍姆的著作）。我的数据中可以看到穆斯林多数国家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论点：根据经济学人智库和自由之家测量的自由度较高的国家，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出版物数量往往也相对较高。虽然这一论点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早期的发现已指向了这一方向。

结语和挑战

穆斯林多数的研究系统是充满活力且大多为新兴系统。在科学出版物数量上，它们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即使在考虑到全球研究出版物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部分这些国家的科学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增长最快。然而，前方仍然面临一些挑战。这些科学系统的科学影响力在引用认可方面存在差异，而引用认可的积累自然需要时间。在这方面，一个

挑战是较小且资金充足的系统通过付费双重隶属关系来加速引用认可的发展的倾向。作为快速崛起的科学系统，穆斯林社会应关注可持续的能力建设（即培养人才和改进系统政策），而非短期的胜利。此外，领域分析

表明人文学科的比例较低。人文学科研究无疑是最具文化丰富性的领域，穆斯林社会在全球人文学科研究中有许多值得贡献的地方。

高等教育研究的指数增长及同行评审面临的挑战

马可·西伯

马可·西伯 (Marco Seeber)：挪威阿格德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Agder) 教授

电子邮件：marco.seeber@uia.no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高等教育研究的产量增长了五倍，从 2002 年的 630 篇增加到 2022 年的 3,279 篇。这种增长是由投稿数量同样惊人的增长所造成的。高教领域内最大的期刊现在每年要审阅数千篇文章。这样的规模变化对高等教育期刊的管理和同行评审过程意味着什么？

数量和复杂性的增加对维持同行评审过程的专业标准和规范提出了多重交织的挑战。本文基于其他领域的经验和对同行评审研究的见解，讨论了一些关键的权衡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编辑过程的一致性

众所周知的同行评审问题之一是评审者之间的一致性低：稿件的命运往往取决于评审者的选择，这就是所谓的“评审员抽签运气”问题。虽然人们期待评审者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一致，但同时也希望同行评审过程的质量和及时性在同一刊物的不同投稿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然而，虽然每年几百份投稿可以由主编在几名副主编的支持下处理，但数千份投稿需要许多副主编，甚至几名主编。编辑越多，维持统一的编辑标准就越困难。期刊应确保拒稿率和出版时间在不同编辑之间没有系统性差异。

特刊可能会对编辑一致性构成另一个挑战。在短期内，特刊可以“一举两得”：它

们吸引投稿，同时不会使编辑工作负担增加。然而，编辑不应完全将审稿过程的管理委托给客座编辑，以避免期刊声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受损；编辑应监督同行评审过程，并要求独立评审。

寻找评审人

同行评审依赖于自愿原则——科学家们评审他人的论文，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某种程度上喜欢这样做，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对学术社区的互惠和服务意识。然而，日益增加的以出版数量和引用次数为基础的绩效指标使用，抑制了那些未被这些指标衡量的活动。这也是为什么编辑在寻找审稿人时面临困难的原因之一。扩大的社区和增多的期刊可能会加剧这些问题，因为它们削弱了志愿服务和互惠互利的社区原则：当邀请来自于您认识的人或可能处理您未来投稿的编辑时，审稿的动机更强，而当邀请来自每隔几年就更换一次的编辑时，这种动机则较弱。

也有证据表明，少数科学家承担了大部分的同行评审工作，而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增加了不劳而获的机会。也许通过在领域内的期刊之间共享同行评审数据来监控评审接受情况，可以限制这种不劳而获的问题，但这样做可能会使同行评审成为一种义务，并进一步培养工具化的心态。事实证明，对审稿人进行金钱或非金钱奖励很难有效吸引审稿人，而且对同行评审的质量可能有害。要求

作者推荐审稿人的做法也应慎重，因为这类审稿人与编辑挑选的审稿人相比，整体得到的正面评价往往更高。

学者们往往不愿意评审质量差或与其专业不匹配的文章。因此，编辑应当选择性地邀请审稿人，谨慎地发出邀请，并个性化地处理这些邀请。出版商可以利用数据的日益可得性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开发新工具来识别潜在的审稿人。作为编辑委员会成员不应只是一个荣誉性角色；评审工作应当频繁且系统地进行。这将有助于解决审稿人不足的问题，培养社区意识，并帮助保持更为一致的评价标准。

管理数量

虽然编辑应该有选择地避免质量差的稿件进入评审阶段，但他们也应避免极端选择性。一些领域对科学产量的大规模增长作出回应，采用了极其严格和耗时的同行评审过程。极端选择性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的质量，往往会导致最具创新性的贡献被拒绝。这种现象在医学领域有所观察，精英期刊经常拒绝被引用最多的文章；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论文录用率为 10~15% 的会议比录用率为 15~20% 的会议影响力更低。

监控质量

审稿人获取原始数据的途径有限。越来越大的发表压力会促使更多作者利用这种信

息不对称，因此有必要采取新的编辑措施，例如向审稿人，甚至可能向读者提供研究报告所依据的数据。此外，发表论文的压力为掠夺性期刊创造了一个日益增长的市场，而这些期刊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被发现。这类期刊假装执行严格的同行评审程序，同时接受几乎任何投稿，以换取“开放获取费”。同行评议的透明度，包括公布同行评议报告，有助于通过显示其评议过程的质量来维护合法的渠道。

寻找编辑

对于编辑来说，自愿性也很重要。虽然每年管理几十篇文章的同行评审过程是一项合理的志愿工作，但管理几百篇文章就很难称得上是志愿工作了。过重的工作量会使编辑工作失去吸引力，有可能只有资历较浅的学者才愿意从事这项工作，而且只是出于职业发展的目的，时间也很短，导致人员流动频繁，缺乏经验。此外，追求质量的学术编辑与一些出版商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多，因为出版商的利润越来越依赖于开放获取的费用，而且他们也希望增加出版物的数量。一些出版商为了解决这种摩擦，让学者不再担任编辑职务，而是将这些职务分配给自己的员工。未来，这种更大规模的转变可能会对我们领域同行评审的质量和诚信构成最大的威胁。

拉丁美洲高等教育的转型：利益相关者的看法

里斯·雷斯伯格

里斯·雷斯伯格 (Liz Reisberg)：Reisberg & Associates, LLC 国际高等教育顾问、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研究员

电子邮件：reisberg@gmail.com

国际教育创新大会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每年在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学 (Monterr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Higher Education) 校园举行。该活动在因疫情暂停数年后，于 2023 年 1 月恢复举办。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数百名教育工作者亲临现场，在线参与人数也达到几万人。通过观察主题演讲和会议的议题，以及聆听与会者之间的对话，这一活动是了解该地区最新趋势的良好机会。本次会议中，人们对新技术的兴趣尤为凸显。

新技术：朋友还是敌人？

会议中，人们对 ChatGPT 特别关注。在发言人和参与者中，聊天机器人目前被视为教学的威胁而不是工具。关于人工智能 (AI) 以及人工智能在各个层面上对高等教育未来意味着什么进行了许多讨论。每个人都意识到 AI 的发展，但了解 AI 的人却很少，因此问题远多于答案。

此外，众多营利性厂商作为参展商、赞助商或举办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提供的数据虽有用，却夹杂了自我宣传。高等教育中的创新常常与新技术的使用混为一谈。除此之外，一个快速扩展的商业领域正为大学提供各种技术，范围包括从学习管理平台到可以让人们进入新现实的软件和小工具。每次演示时，参与者都会聚集在展示厅的展台周围。

显然大家对这些新技术的潜在价值充满兴趣。尽管对商业部门的扩张保持质疑是容易的，但新技术将为全球大学带来重要机遇。

主题演讲者强调，单靠技术本身无法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但它确实带来了许多令人兴奋的可能性。蒙特雷理工大学几十年来一直处于技术创新的前沿，并且继续引领该地区，甚至是整个南半球。想象一下，在蒙特雷的一堂课上，有伊莎贝尔·阿连德 (Isabel Allende) 作为特邀嘉宾，而且她甚至不需要离开她在旧金山的家。使这成为可能的是蒙特雷理工大学全息技术实验的成功。她的形象不仅可以出现在墨西哥，她还可以与每个学生进行眼神交流和互动。这项技术可以让阿连德女士同时出现在多个国家的多个教室中，可能会为各个机构提供接触全球人才和专业知识的时机，而所需花费的投资只是一小部分旅行费用。

变革，是的：但变革是什么？又如何变革？

显然，全球地方讨论的趋势和问题也困扰着拉丁美洲的教育工作者。“主动学习”、“适应性学习”、“基于能力的教育”等词汇对每个人都很熟悉。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微认证 (micro-credentials) 在弥合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差距的潜力。这个地区显然对高等教育的当前关键问题有清醒的认识。

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如何从现状迈向高等教育未来所需的目标。

高等教育的传统模式是为学生提供特定知识以胜任特定职业。这样的传统模式在过去有用，现在的效用已大不如前，然而它仍然是主流模式。系统的僵化和各类院校之间缺乏差异性，无论公立还是私立，都阻碍了创新。虽然偶尔有提到微证书和短期教育周期的新模式，但这些讨论并未深入展开。

变革迫在眉睫，但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变革肯定需要具有未来愿景的领导层，但过程既要自上而下、也要自下而上来推进。教师是变革所需的关键要素，但目前很少有大学教师准备好应对影响该领域的趋势。蒙特雷理工大学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案例研究和参考，供人们了解变革是如何进行的。支持变革的资源在多个层面上可用，如：对工作坊、导师、课程和教学法重新设计的资金支持，以及在绩效评估中对尝试新想法的认可。拨款鼓励实验创新的教学策略或技术。进展和结果得到衡量。成功案例在该机构的多个校区分享并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同时，该机构的领导层持续访问世界各地的校园，参照全球标准和趋势进行基准测试。学校根据自身的独特情况和使命调整国际经验，以确保变革与该机构服务的公共需求相关。这

里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目标不是模仿其他国家的做法，而是将他人的经验作为参考，进行有针对性的应用。

改革高等教育领域将面临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资源的有限性。通货膨胀依然困扰着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而且（通常）新技术的采购需以美元或欧元从全球北方购买。尽管蒙特雷科技大学及该地区其他几所机构在积极推进改革，但私立和公立部门在投资技术、基础设施和职业发展方面的资源仍相当有限。尽管互联网的普及帮助拉丁美洲与其他地区建立了联系，然而在短期内，若想在创新和发展方面取得更大进步，仍需要对技术进行进一步且显著的投资。

资源问题将持续成为一大挑战，但通过与国际大学及私营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投资的成本压力。劳动力市场依赖于高等教育的产出，而私营企业在这一领域的投资迄今为止仍寥寥无几。与产业界的关系需要被培育，双方的共同利益也应被识别并追求。此外，还有众多营利性供应商，它们也应该意识到培养未来客户的重要性；通过帮助教育机构完成初期采购，这些企业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建立市场份额并获益。

韩国学生海外留学模式的变化

金奎石、崔雄植

金奎石 (Kyuseok Kim) : 韩国高丽大学 (Korea University) 教育系博士生

电子邮件: k.s.mick.kim@gmail.com

崔雄植 (Edward Choi) : 韩国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 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 eddie.chae@gmail.com

韩国教育部的一份最新报告引起了人们对韩国学生在外国大学学习人数的变化趋势的关注,这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今,韩国学生不再大规模地出国留学。前往中国、日本和美国等热门教育目的地的出境留学人数的下降反映了全球和国内的社会文化及政治发展,这对韩国政府、教育消费者以及其他与学生流动相关或受其影响的利益相关者有着多方面的影响。

追求卓越

韩国的留学历史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政府放宽了旅行限制和获得外国高等教育学位的限制。长期以来,出国留学对于许多无法进入韩国顶尖高校(即所谓的“SKY”——首尔国立大学、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学生来说,是第二好的选择。

对于这些人来说,进入外国大学学习在就业机会方面是有优势的。还有一些学生放弃了国内的教育,追求相对更有声望的国际学位。具有强学术背景和财力的年轻韩国人中,仍然有人渴望进入美国的哈佛大学、日本的东北大学或中国的清华大学学习。这些学生可能会带着竞争优势回到韩国市场,至少在劳动力市场的某些部门如此。众所周知,韩国社会中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和其他成功人士持有外国学位。

追求外国学位可以用几百年来困扰国家的“教育热”来解释,这可以追溯到 14~20 世纪的韩国,甚至更早。因此,韩国是与中国和印度并列的世界主要留学生输出国之一也就不足为奇了,韩国学生的主要目的地是中国、日本和美国。根据韩国教育部的数据,2022 年有多达 12.4 万名韩国高等教育学生在海外留学。该数字大约是法国、伊朗、马来西亚、美国和越南等国家的两倍。

数量减少

1991~2011 年间,韩国学生出国留学人数增长近五倍,然而在近年来已逆转。事实上,韩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数量下降是急剧的。实际上,韩国高等教育阶段的出国留学人数从 2011~2022 年减少了近 53%。一些曾经深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现在接待的韩国学生数量大幅减少。以美国为例,2010~2011 年有 73,351 名韩国学生赴美留学,而 2020~2021 年这一数字下降至 39,491 人,减少了 46%。其他热门留学国家的情况也同样显著,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加剧烈:中国的韩国留学生从 2017 年的 73,240 人下降至 2022 年的 16,968 人,减少了 77%;英国从 2011 年的 17,310 人下降至 2022 年的 4,798 人,减少了 72%;而日本则在同一时间段内减少了 45%。

国内和全球情况的演变

出国留学人数的下降是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现象。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持续的青年人口减少。我们可以看到，出国留学人数下降 53% 与 6~21 岁人口总数下降 24% 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换句话说，随着大学入学人口的总体下降，可能会有相应比例的学生不再选择出国攻读学位或学分。考虑到 2022 年韩国的生育率已降至全球最低，仅为 0.76，未来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出国留学人数与人口减少之间更为紧密的关系。

其他的一些原因，许多是相互关联的，包括新冠疫情、全球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上升、新兴在线教育平台（如 K-MOOC 和密涅瓦大学的慕课课程）、国际分校的建立、安全问题（如美国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以及政府提高国内高等教育能力和水平的努力。这些因素不仅解释了传统出国留学模式的中断，也揭示了一些流动趋势的变化。例如，随着对美国安全问题的日益关注，再加上高等教育费用的上升和前任美国政府实施的严格移民政策（即所谓的“特朗普效应”），这些因素很可能促使国际学生转向其他英语国家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或甚至转向法国、德国和荷兰等欧洲国家。这些欧洲国家在 2022 年成为韩国学生的重要留学目的地之一。

展望未来

过去三年韩国对外国高等教育的压抑需求可能会在疫情后反弹。早期迹象已经显现。例如，美国的韩国学生人数已从 2020~2021 年的 39,491 人增长到 2021~2022 年的 40,755 人。我们认为，这种反弹并非意味着出国留

学人数会持续上升，而更像是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暂时性挫折的“反弹”。未来，受前述多种因素影响，出国留学的趋势可能会继续波动。

特别是，学者们已经观察到，韩国政府为提升国内高等教育质量所做的努力，有效缓解了人才流失。这些努力逐渐融入国家国际化议程，旨在建立知识型经济，并且在近年来不断扩大（更多项目）和加大（更多资金）。这些举措的例子包括：“21 世纪智慧韩国”项目（Brain Korea 21）；“世界一流大学”项目（World Class University）项目；最近的“留学韩国：计划（Study Korea 3.0），目标是在未来十年内招收 30 万名外国学生；以及主要旨在提升韩国区域竞争力的“全球本土化大学”项目（Glocal University Project）。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全球环境的变化，一些更具吸引力的留学目的地正在吸引更多韩国学生及其家庭的关注。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荷兰等国，以及亚洲的新加坡，已成为越来越多韩国学生的新选择。这些国家能否在长期内继续保持作为热门留学目的地的地位？众多推动力和拉动力交织其中，未来发展尚需时间检验。此外，随着与新文化和不同国家的接触与交流增加，跨国学术合作也有可能进一步发展。

出国留学下降的影响范围（就受影响国家而言）和持续时间尚未被人们完全理解。全球环境不断变化会使目前观察到的趋势可能发生变化。此外，今年早些时候，韩国在境内留学的外国学生人数突破了 20 万这一重要里程碑。由于前文提到的“留学韩国 3.0”计划，这一数字预计将继续上升。这对历史上以输出国著称的韩国意味着什么？韩国是否正在逐步实现其成为区域高等教育中心的愿景？目前仍有许多疑问，时间将告诉我们

当前的外派和入境趋势是否会持续，韩国能否成功实现外国学生来源的多样化，尤其是目前大部分国际学生来自少数几个国家（如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韩国可能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机遇，这将对地区内的学生流动模式产生影响，并在较小程度上影响亚洲以外的外国市场。虽然至

少在短期内，韩国作为重要生源国的地位可能会保持不变，但我们有必要关注不断变化的形势，更重要的是，关注提高本国高等教育竞争力的国家理念、不断发展的全球形势以及韩国消费者对留学态度的变化之间的关系本身就十分有趣。

澳大利亚：腐败丑闻与国际学生

安东尼·韦尔奇

安东尼·韦尔奇 (Anthony Welch)：澳大利亚悉尼大学 (University of Sydney) 教授

电子邮件：Anthony.Welch@sydney.edu.au

澳大利亚长期以来一直是国际学生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虽然与许多国家相比，其教育系统规模较小，但其靠近亚洲的地理位置、文化多样性、较高的大学排名以及作为英语母语国家的地位，对许多人尤其是亚洲学生具有吸引力。从系统层面看，国际学生占澳大利亚总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四分之一以上；在许多大学，尤其是研究密集型的八校联盟 (G8) 中，这一比例更高。在几所大学中，该比例已接近一半，有一所大学的比例甚至更高。

但这一看似成功的背后忽视了一个软肋，即如今已发展成为一个价值 270 亿美元的产业。由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资金不足，澳大利亚大学积极通过招收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弥补收入缺口，因为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远高于本地学生。从国际角度看，澳大利亚被广泛认为在国际学生招募方面采取了特别具有创业精神的方式。其中包括广泛使用教育代理，这些代理虽然负责招募约四分之一的国际高等教育学生，但仍处于监管空白状态。

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

这一问题在尼泊尔的入学人数激增中尤为突出。尼泊尔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仅略高于 1,000 美元，中产阶级规模也很有限。然而，尼泊尔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爆炸性增长，

从 2015 年的不到 1 万人增加到 2019 年的超过 6.5 万人，引发了警报；但是，之前的教育部长和联邦教育部门未予以重视。到 2022 年，尼泊尔已成为澳大利亚第三大国际学生来源国，仅次于中国和印度。国家高等教育监管机构和大学也未能解决这一问题。看到这一机会，在尼泊尔从事为澳大利亚院校招收学生的中介人数从几百人猛增至 3,000 多人。尼泊尔学生中有很高比例的家庭成员作为附加申请者，他们被认为容易受到剥削性工作条件和系统性薪资不足的影响，有时这种情况由本国人经营的小企业造成。2023 年的一项议会调查还提到，侨民社区利用社交媒体在学生到达之前与他们联系，以利用他们的脆弱性。

总体而言，数千名学生获得了前往公立大学学习的学生签证，但随后迅速将注册转移到学费较低的另一教育机构就读职业课程，这些教育机构显然在没有学生正式从原大学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促进了课程转移。在另一些情况下，腐败中介雇佣全科医生和咨询师提供医疗证明，让留学生转到其他低质量的私立教育机构学习。澳大利亚的制度规定，国际学生在初次注册后的六个月内希望更换就读学校，必须获得原学校的允许后才能转校，但疾病或突发事件可以作为更换的合理依据。

腐败的财务基础

腐败中介之所以参与协助从声誉良好的公立大学挖走留学生，并将他们引向低质量的私立教育机构，是因为这些机构支付更高的佣金，但对课程质量的关注较少。当中介可以赚取高达学费 40% 的费用作为佣金时，经济回报很容易压倒课程质量和相关性。留学生可能会被全职工作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虚假承诺所诱惑，而与此同时，腐败的中介却能从质量低劣的私立教育机构获得巨额经济回报。

在许多此类案例中，尽管留学生已经支付了学费，但他们甚至没有上职业课程直接进入了澳洲的劳动力市场，其他证据显示，他们容易受到剥削和低薪待遇，有时是由他们自己的同胞所为。在新冠疫情期间，澳大利亚取消留学生工作小时数限制的决定可能助长了这种剥削。从 2023 年 7 月起，留学生工作时间将限制为每两周不超过 48 小时，但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做更多工作以阻止系统的滥用。有证据表明，英语能力低的妇女被带到澳大利亚获得学生签证，但最终被迫进入成人服务行业，以偿还“控制者”制造出的巨额债务。目前已有十几家教育中介被发现构成腐败并参与促成性贩运。

捕猎者和看守者：监管失败

这些严重的失误突显了对系统进行更严格监管的迫切需求。学生签证常常被滥用，成为移民途径，而不是高等教育的基础。不择手段的中介往往也非常乐意利用系统中的漏洞，从中牟利。劣质的私人办学机构往往向愿意把学生引向其门下的中介提供有利可图的诱惑。一些中介利用系统漏洞，从信誉

良好的机构获得录取通知书（从而获得学生签证），同时计划将学生转到低质量的培训机构。

联邦政府尚未公布其委托撰写的《尼克松报告》（*Nixon Report*），据悉该报告揭露了签证系统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以及对留学生普遍存在的剥削性工作条件和低薪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教育中介的监管不力造成的，大多数教育中介的行为符合职业道德，但也有一些教育中介存在腐败现象，他们对教育成果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对潜在移民成果和转学费用的重视程度。事实上，与移民中介不同，教育中介完全不受监管。正如最近一次议会调查的一位证人所言，“我的狗都可能是中介”。澳大利亚的经验可以为其他依赖中介进行招生但又未能对其进行充分监管的系统提供有益的借鉴。

除了教育中介不受监管的问题之外，用于监督签证制度的资源也不足。联邦内政部只雇佣了不到 20 名工作人员来负责 5,000 多家注册培训机构。

需要做什么？

显然，澳大利亚迫切需要采取跨部门、全政府的方法，让联邦教育部、移民部和内政部参与进来。澳大利亚州政府和大学也需要参与其中，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管理局（*Tertiary Education Quality Standards Authority*）和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管理局（*Australian Skills Quality Authority*）等监管机构也需要参与其中。需要调配更多的资源来解决签证处理过程中的重大延误问题，减少 100 多种不同的签证类别，并确保学生签证用于其预期目的。需要扩大洗钱立法条款的适用范围，将移民和教育中介以及私立教

育机构也包括在内。学生签证和高等教育系统中普遍存在的欺诈行为，以及未能规范教育中介和清除系统中的腐败分子的情况，必

须终止。不能允许成千上万的弱势留学生受到剥削，也不能允许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声誉受到损害。

通过协作式在线国际学习提升国际化：平衡证据与普及

马亚·格拉什维利、杰拉尔多·布兰科

马亚·格拉什维利 (Maia Gelashvili)：美国波士顿学院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博士生、研究助理

电子邮件：gelashvi@bc.edu

杰拉尔多·布兰科 (Gerardo Blanco)：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副教授、学术主任

电子邮件：blancoge@bc.edu

在“协作式在线国际学习”(Collaborative Online International Learning, 以下简称为 COIL) 项目中, 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师和学生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 共同合作, 联合设计并实施课程。虽然整个课程可以通过 COIL 进行, 但 COIL 的组成部分通常持续五到八周。在一个典型的 COIL 模块中, 学生共同分享课程内容, 一起参与课堂讨论, 并合作完成项目。工作小组有意将来自不同院校的学生组成, 以促进跨文化对话,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能力。

由于 COIL 的设计和 implementation 依赖于技术, 不需要教师或学生进行旅行, 因此这种形式的学习成本低、灵活性强, 且相比传统的学生流动方式, 碳排放更少。它可以包括同步和异步的学习方式, 既可以作为学分课程提供, 也可以作为课外活动进行, 并且可以在任何学科、无论是研究生还是本科生课程中实施。

COIL 具有高度协作性, 遵循自下而上的方法。它为学生和教师提供了比较和对比本地与全球知识、经验以及教学方法的机会, 同时增强了他们的全球意识。虽然有些学校设有专门的行政办公室来支持创建 COIL 模块, 但设计和教授该课程的教师是主要的参

与者, 他们独立工作, 同时与国际同行共同合作。

协作式在线国际学习的普及

COIL 在 20 年前由纽约州立大学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首次发起。然而, 在随后的大部分时间里, 这一实践并未广泛传播。新冠疫情期间的边境关闭和旅行限制推动了 COIL 的使用并增加了其重要性, 并为其提供了新的解读。一个记录参与 COIL 项目的机构的在线目录显示, 全球 40 个国家的 258 所机构提供 COIL 模块, 但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尽管各院校早在 2006 年就开始实施 COIL, 但约有三分之二 (160 所) 的院校是在 2019 年或之后才开始投入 COIL。

尽管 COIL 潜力巨大, 但这一实践主要局限于高收入国家。虽然上述目录没有一致使用区域标签, 但一些趋势仍然可以看出。例如, 实施 COIL 的机构包括北美的 115 所和欧洲的 43 所, 而非洲仅有 4 所。拉丁美洲是一个反例, 若包括中美和南美, 共有 80 所机构。在该地区, 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天主教大学协会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和墨西哥国际教育协会 (the Mexican Associ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等组织积极推动了这种方法的合作与培训。

所院校开设了 COIL 课程,是开设 COIL 课程最多的国家。考虑到 COIL 源自美国,这一情况并不意外。然而,这些数字也表明,在资源较少的地区,实施 COIL 的机构非常有限,这反映了并非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具备实施 COIL 课程所需的资源。

随着 COIL 课程的普及,关于其效果和影响的学术文献和分析也随之增加。研究结果总体上是积极的,表明 COIL 有助于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发展,并且还鼓励那些原本没有计划出国留学或参加交换项目的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总体而言,学生对 COIL 体验评价较高,并愿意参加更多的 COIL 课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是单一案例研究和自我报告的形式。

协作式在线国际学习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尽管 COIL 通常由个别教职工推进,但人们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机构国际化的形式,更具战略性地加以利用。它可以用来促进校内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和社会国际化。

从推动国际化的角度来看,单靠学生的实体流动是不够的,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学生(约 1%)能够参与其中。即使在美国和欧盟,参与比例约为 10%,但对于有残疾的学生、需要打工以维持学业的学生或有家庭责任的学生来说,如果国际化的学习成果只能通过实体流动获得,他们将无法获得这种体验。像 COIL 这样的校内国际化项目,可以帮助使国际化战略更加包容,即便 COIL 的好处也并非均匀分布。

通过无需旅行即可支持跨文化交流,并

让学生接触更多地理上多样化的地区,COIL 减轻了一些环境影响。它也有助于弥补从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不平衡的学生流动,这种流动重新巩固了西方和英语的霸权。疫情期间教学领域的技术转变并没有为全球高等教育带来更多的平等,因为各国及其大学对技术的获取能力、在线教学的准备程度和适应能力存在不平等。同样的挑战也影响到 COIL 的实施,因为 COIL 需要充足的财务、时间和专业发展资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和机构在 IT 基础设施、数字能力以及财务和人力资源方面更具优势,能够为其学生提供 COIL 体验。

平衡之术

随着一些大学急于恢复线下的国际化,重要的是不要放弃像 COIL 这样的有前途的实践。这种方式可以为更多的学生和教职工,尤其是为不同学生群体,提供获得国际和跨文化理解的机会,并帮助各机构使其国际化实践更加全面和包容。

尽管可以预见到早期积极采用 COIL 的参与者与该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会有一定程度的重叠,但系统和独立地研究 COIL 的有效性仍然至关重要。随着 COIL 越来越受欢迎,必须避免将其变成一时的潮流或趋势,因此需要谨慎实施,并与其他方法区分开来。COIL 的基础是课程的国际化,但还有其他虚拟交流方法不需要嵌入课程中;同样,其他形式的虚拟国际化也正受到关注。COIL 无法取代线下的流动性,因为后者提供的体验是单一或多个 COIL 课程无法替代的。因此,COIL 可以与线下的国际流动相结合,以实现更好的效果。一些已经将 COIL 与线下元素结合的混合型留学项目显示出良好的效果。

虚拟交流不断演变的格局：第三次全球调查的发现

凯尔·卡斯特勒、拉吉卡·班达里、梅尔金·拉莫斯

凯尔·卡斯特勒 (Kyle Kastler)：美国阿斯彭研究所 (Aspen Institute, United States) 的项目经理

电子邮件：Kyle.Kastler@aspeninstitute.org

拉吉卡·班达里 (Rajika Bhandari)：班达里国际教育研究和战略公司负责人

电子邮件：rbhandari@rajikabhandari.com

梅尔金·拉莫斯 (Melquin Ramos)：国际教育专业人士、研究助理

电子邮件：melquinramos@gmail.com

随着全球虚拟交流 (virtual exchange) 项目的持续扩展，关于这些项目可持续性的问题讨论也日益重要，尤其是在新冠疫情逐渐消退、线下国际流动恢复的情况下。基于前两次调查的成果，最新的 2022 年《虚拟交流领域调查》(2022 Survey of the Virtual Exchange Field) 旨在解答这些问题，提供关于虚拟交流项目多样化特征和模式的洞见。该调查是由史蒂文斯计划 (Stevens Initiative) 发起的年度活动，旨在解答这些问题。2022 年的调查包含来自 126 个机构的回复，这些机构详细介绍了其 2,565 个项目，这些项目连接了全球 120,714 名参与者。

今年的调查报告中新增了五个案例研究，深入探讨了虚拟交流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广度和复杂性。特别是今年的报告强调了如何解决“数字鸿沟”对全球南方 (利比亚、墨西哥和南非) 虚拟交流项目交付的影响，并探讨了语言的作用、背景的重要性以及资源分层带来的影响。

虚拟交流的增长与变化

近年来，虚拟交流无疑得到了迅速扩展，但其增长过程是复杂且非线性的，不同的提

供者之间存在差异，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疫情的影响。一方面，疫情推动了虚拟交流的发展，58%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因疫情增加了相关项目。因此，2021 年第二次调查中虚拟交流的显著增长可能是由于疫情的影响，许多组织和机构首次探索 VE 项目，因为传统的国际流动项目暂停运行。随着线下国际流动项目在 2022 年迅速恢复，那些仅将虚拟交流作为暂时填补空缺的提供者可能已经回归到原有的项目安排。总而言之，疫情可能导致了虚拟交流的激增，但某些提供者要么不愿意维持这种增长，要么难以长期保持。

鉴于这种喜忧参半的情况以及每次调查中不同的受访群体，最可靠的变化评估来自于 2021 年和 2022 年均参与的 71 个虚拟交流提供者的子集。在这一群体中，实施的 VE 项目总数从 2021 年的 1,464 个增加到 2022 年的 2,022 个，增长了 38%，而参与者人数从 80,737 人增加到 98,750 人，增长了 22%。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 71 个提供者大多数是高等教育机构或在多个国家运营的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这也表明这些提供者更有能力持续提供数据报告。

理解虚拟交流的背景和多样性

以往调查的主要启示之一是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全球虚拟交流的运作方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22 年的报告中特别展示了来自不同地理位置的五个虚拟交流项目案例研究，这些研究揭示了虚拟交流的多样性，并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角，从中可以看到一系列问题，如多样性与可及性、内部与外部的协作、所有利益相关者（学生、教职员、管理人员、领导、合作伙伴）之间的期望设定与管理，以及语言与沟通的作用。

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虚拟交流中的多样性与可及性，以及这些问题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在美国，由于社区学院的国际化努力通常较为有限，在加泽尔国际（Gazelle International）的“国际能力与知识的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 for Intern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Knowledge）项目的案例研究显示，虚拟交流如何赋能教育工作者利用技术使其课堂国际化。虚拟交流及其国际化潜力能够帮助吸引和招募更多社区学院层级的学生，从而增加这类学生的虚拟交流和国际化机会，而这些学生可能在其他国际化努力中被忽视。

在全球南方国家，虚拟交流的可及性可能受到限制。例如，南非德班理工大学的案例研究显示，基础设施不足（包括缺乏电力）常常阻碍虚拟交流的实施。类似的主题也出现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文化语言交流”项目（Culturingua）项目的案例研究中，该案例揭示了在利比亚等国家开展工作时所面临的挑

战，在这些国家，主要城市以外的地区基础设施和技术接入可能有限。此外，“文化语言交流”项目还致力于改善因残疾而被排除在外的学生参与虚拟交流计划的机会。

这些案例研究表明，虚拟交流提供者在设计和实施项目时，必须考虑技术的两面性。一方面，技术可以作为推动者，但同时它也可能创造数字鸿沟，因为世界许多地区的技术获取仍然不均衡。

展望未来

2020~2022 年间进行的三次《虚拟交流领域调查》正值全球教育和交流发生重大转变之时。最新的调查表明，尽管虚拟交流的增长方式复杂多样，但它将继续发展。这种调查努力为持续深入的探索提供了可能性。调查结果还帮助机构领导者和决策者评估虚拟交流如何成为其更广泛国际化目标中的关键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他们可以通过战略性地整合不同形式的流动与交流，使其相互补充，而非竞争。

这项调查是一项重要的早期努力，它提高了人们对获取志愿服务计划数据必要性的认识。然而，与许多新的大规模研究项目一样，仍存在挑战，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已经确定了以下需要更多研究的领域：如何衡量虚拟交流的质量，包括项目在交付方面如何确保质量；深入了解虚拟交流促进者和教育者的角色，尤其是如何支持他们的成长与职业发展；以及帮助项目提供者（特别是资源有限的小型机构）增强收集和报告虚拟项目数据的能力。

欧洲的学术薪酬与职业发展：吸引人才的挑战

爱丽丝·西维拉、埃里克·莱曼、米歇尔·梅奥利、斯特凡诺·帕莱里

爱丽丝·西维拉 (Alice Civera)：意大利贝加莫大学 (University of Bergamo) 管理、信息和生产工程系助理教授、西萨尔皮诺比较研究所 (Cisalpino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Studies) 成员

电子邮件: alice.civera@unibg.it

埃里克·莱曼 (Erik Lehmann)：德国奥格斯堡大学 (University of Augsburg) 教授、西萨尔皮诺比较研究所

电子邮件: erik.lehmann@wiwi.uni-augsburg.de

米歇尔·梅奥利 (Michele Meoli)：意大利贝加莫大学管理、信息和生产工程系副教授、西萨尔皮诺比较研究所成员

电子邮件: michele.meoli@unibg.it

斯特凡诺·帕莱里 (Stefano Paleari)：意大利贝加莫大学管理、信息和生产工程系教授、西萨尔皮诺比较研究所成员

电子邮件: stefano.paleari@unibg.it

学术薪酬是吸引和留住学术人才的主要手段。然而，全球范围内，学术工资很难与私营部门竞争，并且未能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欧洲的薪资似乎无法与美国的薪资竞争。美国的一名普通教授年薪为 14.04 万美元，比英国教授的薪水高 1.3 倍，英国是欧洲薪酬水平最高的国家。因此，对欧洲进行深入分析是必要的。本研究旨在比较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四个欧洲国家的学术薪酬方案。德国和英国的薪酬较高，无论是入门级还是处于职业生涯顶峰的人员，这得益于这两个国家允许的薪酬协商过程。意大利是我们研究中唯一一个薪资固定的国家，没有可变成分，也没有协商空间，这使得该国的学术界处于极大劣势。

欧洲的学术薪酬

本研究的重点是净薪资 (net salaries)：

然而，本研究的计算相当具有挑战性。我们结合了各国财政部提供的国家官方数据与国家税收和福利系统提供的数据，结合各国系统自身独特的规则和特点，通过与当地审查人员的访谈，对各国的特殊性进行了核实。经分析，研究得出了三个要点。首先，法国和意大利与德国和英国在薪酬水平方面存在巨大差距。例如，意大利全职教授的收入约为 62,420 美元，分别比德国和英国同行低 45% 和 60%。不尽如人意的薪酬条件可能导致学者离开，从而使意大利众所周知的人才外流现象长期存在。意大利的学术薪酬在国家范围内也不具竞争力。一个典型的比较例子是意大利银行的薪资，该银行是该国最负盛名的机构之一，其薪资平均比大学高出 1.2 倍。因此，在年轻人眼中，与其他行业相比，学术行业缺乏吸引力。

如果薪资水平不令人满意，人们可能会认为至少职业成长会很快，在更高的职业阶

段可能会有显著的薪资增长。这引出了第二个关键点：在不同职业阶段的薪酬变化并不大。这在法国和意大利尤其如此，教授的收入仅比副教授高 24%。然而，这两个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在意大利，副教授的平均年龄是 52 岁（欧洲最高），而在法国是 34 岁。这一极低的年龄是特定职业轨道设立的结果，该轨道还包括一个介于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之间的职位。在法国，这种职业轨道在系统的可持续性和预期未来表现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驱动因素，即薪酬设置中存在可变成分。可变部分有三种类型：地理因素、福利因素或绩效因素。薪资可以根据人们居住地区的平均生活成本以及/或根据需求、科学生产力和卓越性（通过在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来衡量）进行调整。例如，虽然英国大学可以通过协商更高的薪资来吸引年轻工程师选择学术职业，但德国大学所提供的薪资会考虑到生活成本因素，而法国大学则可以根据员工的家庭负担调整薪资。这些机会在意大利大学中都不存在。

结语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识别了一个国家吸引力的经济因素，这些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仅凭经济因素并不足以使一个国家具备吸引力。其他几个方面，例如生活质量、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学术自主权以及大学的声望，也对吸引优秀学者起到重要作用。此外，薪酬不足可能会使最优秀的学者不愿从事学术职业，并且阻碍他们在这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寻求发展。在本研究中，意大利高等教育系统是唯一没有明确“流动性计划”的国家，这些“流动性计划”旨在吸引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年轻人才。在人才，尤其是寻求国际机会的人才被视为稀缺资源，而大学被视为发展的动力和解决西方经济增长乏力的潜在方案的时期，一些欧洲的大学系统显然更有能力增强其吸引力。不过，意大利政府目前有机会通过“国家复苏和恢复计划”的资金进行改善，尽管这需要时间和额外的资源，但这也许是一线希望。

学术界的吸引力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研究其他国家（包括欧洲内部和外部）的薪酬制度将会非常有意义。决策者应当了解影响学者职业决策的因素，为他们创造有吸引力的职业选择。

在叙利亚西北地区大学学习的挑战与困难

马赫迪·阿尔科尔

马赫迪·阿尔科尔 (Mahdi Alkol)：叙利亚伊德利卜大学 (Idlib University) 经济与管理学院
助理教授

电子邮件: mahdi.alkol@idlib-university.com

叙利亚的持续冲突已进入第十三年。近一半的叙利亚人口为躲避战争逃离了家园，或在叙利亚境内，或外逃至邻国如黎巴嫩和土耳其。截至 2023 年，叙利亚总人口约为 2,670 万，其中 1,700 万人生活在国内，900 万人生活在海外。叙利亚冲突造成了大面积的破坏和严重的损失，多个领域和行业均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自冲突爆发以来，获取庇护所、谋生机会、医疗、教育、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情况也严重恶化。

高等教育是受战争严重破坏的领域之一。自 2011 年冲突爆发以来，高等教育面临诸多挑战。由于大量学校、教育中心和基础设施被破坏，加之人口流离失所、局势不稳定以及教育机构的破坏和工作人员的外迁，教育质量大幅下降。截至 2021 年，叙利亚境内由叙利亚政权控制的地区共有约 30 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如大马士革大学 (Damascus University)、阿勒颇大学 (Al-Baath University)、巴阿斯大学 (Al-Baath University)、塔什林大学 (Tishreen University)、卡拉姆恩大学 (University of Kalamoon) 和沃塔尼亚私立大学 (Al-Wataniya Private University) 等。在叙利亚西北部由反对派控制的地区，2015 年后成立了约 15 所公立和私立大学，其中包括伊德利卜大学 (Idlib University)、自由阿勒颇大学 (Free Aleppo University)、沙姆大学 (Sham

University)、北方私立大学 (Al-Shamal Private University)，以及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大学 (Gaziantep University) 的多个分校。这些大学的总学生人数约为 3.5 万。

叙利亚目前分为多个势力范围，地区控制状况自 2020 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首先，阿萨德政权控制的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 63%，该地区人口约为 960 万。其次，叙利亚民主力量控制着东部和东北部的 26% 领土，居住人口约为 260 万。最后，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占全国领土的 11%，该地区人口约为 430 万，分布在北部阿勒颇乡村的临时政府控制区以及叙利亚拯救政府控制的伊德利卜及其周边地区。

大学学习的困难和挑战

随着 2011 年叙利亚冲突的爆发，大量学生辍学，许多城市发现自己在教育部门面临空缺。2015 年，学者们在叙利亚西北部开设了多所大学，以继续教育并填补该领域的空缺。安全问题和经济原因带来的高辍学率以及叙利亚冲突开始后的流动性问题，显然需要叙利亚在教育领域采取行动。鉴于该地区有成千上万的中学生存在，并且迫切需要挽救叙利亚青年免于无知和迷失，叙利亚的这些大学承担了满足这些年轻人需求并提供培训和教育的责任。

学生面临许多挑战，包括家校间往往较

长的距离、缺乏可靠的交通工具以及因此产生的学生可能无力承担的巨大经济负担，以及身体疲劳。在阿勒颇北部乡村的大学毕业的学生需要经常旅行，行程最长达 150 公里。学生们无法支付临近大学地区的高昂租金，迫使他们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往返家校，而公共交通工具并不能总是抵达家校，因此他们可能中断学业。

其他挑战和困难还包括高昂的学费和其他与学习相关的费用。在叙利亚北部，半私立大学的年费在 150 美元到 500 美元之间，而一些私立大学的年费高达 1,800 美元。所有大学都依赖学生作为其主要和唯一的资金来源。

学位的国际认可

应该说，尽管这些大学努力通过制定新

的和改进现有的教学计划、吸引相关专家和发表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国际同行评审期刊上）来提供所有质量标准和学术认证，但叙利亚大学授予的学位目前并未在国际上获得认可。此外，大学也希望加入各种教育网络，参与不同的排名机构以提升自身排名。叙利亚大学还努力与土耳其和欧洲大学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改善毕业生的情况和他们的排名。叙利亚北部的大学将此类活动视为增加合作和获得认可的支柱，但由于叙利亚持续的不确定性和缺乏安全性，其他国家的大学对与叙利亚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持谨慎态度。

对于成千上万的叙利亚学生来说，由于高等教育部门的许多问题，包括大学学位缺乏国际认可以及叙利亚高等教育在众多监管机构之间的分裂问题，未来犹如一个可怕的噩梦。

中亚高等教育的普及与私有化

阿米娜·沙尔达别科娃

阿米娜·沙尔达别科娃 (Amina Shaldarbekova) :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电子邮件: a.shaldarbekova@gmail.com

高等教育的私有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中亚地区的国家也不例外。在苏联解体后,私有化政策在 1990 年代被引入这一地区,以减少高校对政府资金的依赖。私有化的共同实践包括公立部门的教育服务部分私有化,如在公立大学开始收取学费,同时保留国家资助的名额,并允许成立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本文讨论了中亚四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高等教育部门经历的不同程度的私有化及其对高等教育招生与准入的影响。

背景

20 世纪 90 年代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本性变化给中亚地区的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许多挑战。尽管受到历史和地理因素的影响与联系,但是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在高等教育改革(包括私有化)方面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所有国家都将教育视为社会经济转型的工具。然而,每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变化动态和处理转型的方式各不相同。共同点是,它们都无法为教育分配足够的预算资金。这促使各国开始寻求替代的资金来源,导致了高等教育私有化的启动,此前的高等教育系统是国家所有、国家控制和国家资助的。高等教育私有化的程度决定了各国的入学率。私有化程度较高的国家,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相应扩大。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四个中亚国家的总入学率差异不大:哈萨克斯坦(18.5%)、吉尔吉斯斯坦(12.5%)、塔吉克斯坦(11.6%)和乌兹别克斯坦(14.8%)。但这些比例自那时起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根据马丁·特罗(Martin Trow)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概念,哈萨克斯坦已进入普及阶段,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入了大众教育阶段,而乌兹别克斯坦的高等教育仍然处于精英教育阶段。

私有化路径

在 21 世纪,上述四个中亚国家开始在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中同时招收自费学生和国家资助学生。此外,正如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数据库以及这些国家的统计机构收集的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学费已成为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公立大学中的自费学生比例增加,而政府资助的比例减少。因此,在不涉及公共资金的情况下增加高等教育准入是该地区的共同特征。现在政府只资助少数学生:乌兹别克斯坦约 33% 的学生由国家资助,哈萨克斯坦为 27%,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均为 21%。然而,与哈萨克斯坦相比,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高等教育主要是公立的,因为高等教育扩招主要发生在公立部门,并继续在公立部门进行。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公立与私立部门的扩展

总体而言，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相比，哈萨克斯坦进行了大规模的三重高等教育私有化，可以说是一个极端案例。它是该地区唯一一个在法律上允许建立私立机构和公立大学自费招生的国家。此外，该国还完全或部分私有化了一些从苏联时代继承的国立大学。因此，其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截至 2017 年，该国共有 122 所高等教育机构，其中 50% 以上属于私立机构。这种情况得益于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私立机构的大量涌现，尽管由于政府的监管，部分私立机构关闭或合并，但是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此外，在 21 世纪初，12 所国立大学被转变为股份公司：一些完全私有化，另一些则由国家和私人实体共同拥有股份。此外，哈萨克斯坦超过 50% 的学生就读于私立机构。2017 年，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4.3%，并且继续增长。因此，不仅是公立部门中自费学生人数的增长推动了哈萨克斯坦的高入学率，私立部门也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和扩大化的重要推动力。

吉尔吉斯斯坦是该地区双重私有化的典范。它是由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增长和允许国立大学收取学费而引起的。然而，与哈萨克斯坦相比，吉尔吉斯斯坦的私立高等教育在机构数量和学生数量方面并不占主导地位。2017 年，51 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 16 所是私立的；他们占该国所有学生的 14%。尽管如此，它们也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率：2017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总入学率达到 42.8%。

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入学机会有限的公立部门私有化

乌兹别克斯坦是该地区的另一个极端案例，因为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选择性准入模式。尽管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未得到满足，但公立部门的规模仍然有限。政府通过限制高等教育机构中国家资助和自费学生的数量来严格控制高等教育的招生。此外，自 1991 年以来，高等教育总入学率实际上有所下降。2017 年，这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该地区人口最多的国家（3,230 万），但高等教育参与率非常低，仅为 9%。在塔吉克斯坦，国家也控制着高等教育的供需两方面。

与乌兹别克斯坦类似，高等教育机构完全由国家管理。2017 年，相关年龄组中被大学录取的比例为 31%。此外，乌兹别克斯坦的私立高等教育官方上仍然不被承认。虽然该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曾允许非国家教育机构的出现，但不久后政府就收回了这一许可。在 21 世纪的前十年里，塔吉克斯坦也曾有几次建立私立机构的尝试，但在政府干预下，只有一家机构得以存活。

尽管如此，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还是有提供国家认可学位的外国大学。在乌兹别克斯坦，有七所国际大学的分校，它们被允许自行挑选、录取和培养学生。塔吉克斯坦也有几所俄罗斯大学的分校。事实上，这四个国家都有根据政府间协议设立的俄罗斯大学或其分校。

未来展望

尽管该地区在 1990 年代面临轻微的下降，但自 21 世纪以来，人口一直在上升。总体而言，该地区的人口在稳定增长。此外，与其他后苏联国家不同，这四个中亚国家的

人口结构主要是年轻人,平均年龄为 27.6 岁。此外,2017 年 14 岁以下人口的平均年龄为 30.8%。考虑到高出生率的有利人口趋势,该地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将普遍上升。然而,高等教育的参与率动态因国家而异。对于哈

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来说,问题更多在于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不是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本身;而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机会有限,扩大教育机会的需求则是更大的关切。

新书推介

《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推进机制与成效评估研究》（2023）

作者：刘念才、刘莉

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近年来，“双一流”建设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引领性、标志性工程，成为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在长期稳定的国家战略推动下，我国一流大学的综合实力显著提升，已经表现出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实力和冲击世界顶尖大学的潜力，标志着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数量规模产生成效的基础上，进入高质量内涵式发展阶段。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要能够在高精尖指标上产生突破，要能够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因此，需要设计培养高质量人才、取得突破性原创成果、建设国际学术大师队伍、促进创新型经济发展、强化国际影响力、满足国家战略重大需求等方面的高精尖指标，引导我国世界一流大学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

课题组在二十余年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积累的基础上，依托优势、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紧紧围绕“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的目标与任务，沿着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建设到评价以及动态调整的逻辑，从原创研究、人才培养、学术大师、经济贡献、品牌影响力、服务国家战略六大维度定量评价我国“双一流”建设大学/学科的国际水平与国家贡献，并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探讨

“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与动态调整机制，为我国“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和推进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现实依据、可借鉴的国际经验和可参考的建设路径。

课题紧紧围绕“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的目标与任务，探讨“双一流”建设的推进与动态调整机制，定量评价我国“双一流”建设大学/学科的国际水平及国家贡献。课题共设五个子课题，前三个子课题围绕“双一流”推进机制，按目标分解、推进机制、动态调整的逻辑展开；后两个子课题聚焦成效评估，从国际水平与国家贡献两个角度展开。为了扎实推进研究，课题组围绕国际水平、国家贡献、推进机制设置了10个专题。围绕一流大学设置了6个专题，分别是世界一流大学人才培养指数与案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原创研究指数与案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学术大师指数与案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品牌影响力指数与案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经济贡献指数与案例研究、世界一流大学服务国家战略指数与案例研究；围绕一流学科设置了4个专题，分别是社科类一流学科的指数与案例研究、理学类一流学科的指数与案例研究、工学类一流学科的指数与案例研究、生命医学类一流学科的指数与案例研究。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

(1) 紧紧围绕“双一流”建设的战略目标任务开展研究，扎根中国大地，研究中国问题，对“双一流”建设目标进行了多维分解。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需要在推进人类福祉、成为卓越榜样和服务国家需求等理

念的指引下，以大学自身定位及其全球实力为限域，明晰新阶段的分类发展目标定位。在高等教育强国理念、大学及学科发展规律的指导下，在目标设置理论以及 SMART 原则的基础上，对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战略目标进行了解析，并分解出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建设的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

(2) 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相结合，研制了世界一流大学/学科指数并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服务“双一流”建设为宗旨，本着“高标准、可定量、可实现、国际可比”的原则，从人才培养、原创研究、学术大师、经济贡献、品牌影响力、服务国家战略等关键维度，设计了能引领未来发展的世界一流大学指数和世界一流学科指数以及相应的高精尖指标体系，并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学科、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分析了我国“双一流”建设大学/学科的水平、进步及差距。

(3) 创新性地构建了“双一流”建设的“三阶动态调整体系”。在对世界各国重点建设项目的动态调整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双一流”建设的“三阶动态调整体系”。该体系包括纵向三阶和横向三阶两个视角：纵向三阶体现出项目建设的多元梯度，延展机构的纵深动态发展空间；横向三阶体现出项目建设的多元状态，判断机构在横阶发展的动态表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新时代新阶段的发展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是高质量发展”。过去二十多年，我国一流大学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整体实力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新时代新阶段，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必须有效解决国际影响力较弱、学术大师和突破性创新较少等亟须突破的问题，需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发展以实现科技前沿领域的重大创

新，需要积极维护全球共同利益和成为全球卓越榜样以赢得世界一流的国际声誉。因此，每个专题都在研究发现的的基础上，对我国一流大学/学科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变革中的全球科学体系：学术流动与知识生产》（2024）

作者：陈丽媛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际学术流动在全球科学知识的生产与流通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这一角色变得愈加复杂。本书基于流动政策的国际比较与本土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不同学科、不同类型、不同地域，尤其不同时代国际学术流动如何影响知识生产，进而反思在全球科学体系的分层机制与能动机制共同作用下，全球知识生产的时空变革以及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本书第一章，以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为发达国家代表，以巴西、南非、韩国与中国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代表，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学术人才国际流动政策进行国际比较分析。第二章，通过定量分析考察不同类别、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学术人才国际流动对知识生产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不同学科学术人才的国际流动对国际发表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相较于未发生流动，海外留学对国际发表数量、质量、贡献、合作均存在积极影响，双重流动次之，海外访学的影响相对有限。与此同时，不论留学还是访学，到北美地区流动对国际发表影响比到亚太、欧洲地区流动的影响更大。基于上述发现，第三章与第四章分别对海外留学与访学两种最主要国际流动进行深入考察。其中，第三章，通过中介效应

分析考察国际合作在海外留学与知识生产之间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究海归学者科研合作的生成、维系与拓展路径与过程。第四章，通过半结构化访谈分析访问学者在访期间的学术参与及身份建构，揭示海外访学对知识生产影响相对有限的深层原因。第五章，通过加入流动类别、流动地域与流动世代的交互项，进一步分析国际流动对知识生产影响的时空变化。研究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国际流动，尤其是海外留学对国际发表的影响呈现减弱态势，到北美地区流动对国际发

表的影响逐渐变小，中国呈现出从全球学术体系的边缘、半边缘向中心靠近的趋势。这意味着核心-外围的层级结构对中国学者知识生产的影响呈现减弱态势，全球科学体系中的开放结构属性愈加显现。最后，聚焦“双一流”建设，进一步探讨中国改变全球科学体系的核心——外围结构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改变对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副主编：王琪
编辑：吴燕
翻译：陈若曦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教育学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4458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ociate Editor: Qi Wang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Translator: Ruoxi Chen
Address: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4458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s://soe.sjtu.edu.cn/Web/Content/76>